

唐代长安乐舞研究

——以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乐舞图像为中心

贾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代长安乐舞研究

——以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乐舞图像为中心

贾嫚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长安乐舞研究:以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乐舞图像为中心/贾嫚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161-3452-8

I. ①唐… II. ①贾… III. ①乐舞—研究—中国—唐代②中国画—
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J709.2②J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2201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莉
特邀编辑 胡志宏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96千字
定价 57.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论	(1)
第一章 唐代长安遗存乐舞图像的典型遗迹	(24)
一 墓葬遗址	(24)
二 佛教遗址	(40)
三 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文物	(45)
四 小结	(46)
第二章 西安地区出土唐代文物中的乐舞图像	(48)
一 唐墓壁画中的乐舞图像	(48)
二 唐墓出土乐俑	(101)
三 佛教文物中的乐舞图像	(143)
四 金银玉杂器中的乐舞图像	(164)
五 小结	(180)
第三章 以乐器为核心的个案研究	
——箜篌传播与唐代箜篌专论	(184)
一 箜篌的源起	(185)
二 箜篌的传播路径	(192)
三 箜篌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流播	(198)
四 唐以前箜篌在中国内地的流播与发展	(206)
五 唐京城长安箜篌发展及其特点	(211)

第四章 以舞蹈为核心的专题研究

——唐代乐舞图像程式化考论	(231)
一 唐代以前乐舞图像的程式化	
——以“长袖舞”和“胡舞”为例	(232)
二 中国长袖舞程式的萌蘖源起	(244)
三 西安及邻近地区出土唐代文物中程式化乐舞图像	(251)
四 唐代文物中乐舞图像程式化的特征	(266)
结语	(277)
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95)

引 论

人类文明与历史文化的进程都是在不断变化中发展前进。中国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萌起之地，有悠久的文明史程，并为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最能代表中国文明发展水平，体现中国社会强盛景象，反映中国文化艺术丰富多彩、百花争艳的兴盛景象和横贯中天、睥睨一切的雄浑大气者，当为中国的李唐王朝。从公元6世纪至公元9世纪，以唐朝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支撑着雄踞亚洲的泱泱大国，其昌盛的国力、强有力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民主的人才选用制度以及各民族不同关系的成功处理，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社会的稳定和富强促使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分外活跃与兴盛，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快速发展的有利条件。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的异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提供丰富营养，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顶峰，并留下了不同艺术交融之痕迹。唐代乐舞正是此时期人类精神高度文明、社会物质形态高速发展的形象体现，代表了一个强盛时代的总体风貌，涵盖这个时代审美认知的综合水平。因此，富有代表意义的唐代乐舞融诗、乐、舞于一体，采历代文学、音乐、舞蹈艺术的精髓为一身，和钟、鼓、琴、琵琶、箜篌于轻歌曼舞，实为中国乐舞艺术之代表，对后世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由于唐朝的强盛和唐代乐舞的令人瞩目，作为唐都城长安（今西安地区）也随之成为中世纪中外著名的大都会。“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① 各国使臣来往不绝，四夷之乐

^① 柳宗元：《柳河东集·下》卷二六《馆驿使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40页。

不断涌入长安,形成风格迥异的多民族音乐舞蹈,使唐代乐舞艺术更加光彩夺目,如十部乐,坐、立部伎,法曲,胡部新声等,以其灿烂多姿和丰富多彩受到上至统治者本人,下到间间百姓等不同社会阶层的喜爱和欢迎。唐朝设置有四个专门的乐舞机构,即太乐署、鼓吹署、教坊、梨园,设立于长安城内的这四个乐舞机构集中了大批优秀的乐舞人才,东、西两市坊间也遍布乐舞伎人的足迹,上层有不少擅长乐舞技艺的皇帝、贵妃、公主以及公卿等,民间有更多的仕子、庶民参与其间。此外,达官贵人、京城望族又豢养乐伎成风,伎优姬妾以乐舞为能事,闺门女子又以习音律、通丝竹、善歌舞为闺中娱乐和高雅修养的体现,社会各个层面均表现出“政和世理音洋洋”^①的盛况。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社会共同的审美意趣促使唐代乐舞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并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发展的走向。从唐代长安遗存乐舞图像观察,西安地区考古资料中唐代乐舞图像数量多、质量精、时代特征鲜明、文化内涵丰富,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的珍贵艺术品,更是考察唐代乐舞的重要考古资料。这些乐舞图像的再现,一方面印证了史书典籍的记载,另一方面填补了现存文献中的不足,具有证史、修史、补史和写史的独特功能,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研究长安遗存的乐舞图像对于艺术史、考古学、音乐学、历史学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唐代长安乐舞艺术研究,不仅属于音乐学研究范畴,更属于美术学图像研究范畴,是一种将流动性的乐舞形象转化为视觉描绘的定格体现,对墓室装饰、乐俑造型、佛教像碑、金银玉器等物起着重要的美化作用。从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上的图像观察,乐舞图像是唐一代皇室成员和达官贵人们一种较为恒常的备选图像,配用造型精美和意义深远的乐舞画面以显示皇室公侯的气派与奢华,为现实生活和模拟现实生活增添扬志抒情、陶冶享乐之氛围,从而构成了独具唐代特色的艺术风格。唐代长安留存的乐舞图像以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特有的内涵和装饰美,历来被人们视为考古资料和艺术珍品。同时它又是一种装饰工艺品,其自身所包含的上层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又在不自觉中成为上层阶级弘扬社会伦理、政治抱负、政治功绩和艺术偏好的附属品。唐代乐舞题

^① 白居易:《法曲》,载《全唐诗》卷四二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690页。

材十分丰富,人文与自然并存,宗教与信仰并存,神话与现实并存,抽象与写实并存。其丰富的题材、优美的造型、多变的结构、形神兼备的特点不仅体现了古人杰出的艺术技巧,同时也折射出高超的艺术成就和美学内涵。乐舞图像正是对乐舞丰富内容的高度涵盖,既可言志颂德,又可奢华享乐,同时达到装饰和美化环境的艺术效果。

本书选择原唐代都城所在地——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的乐舞图像作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试图用图像研究的方法,探索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代长安乐舞风貌。所谓“图像研究”,包括图像志和图像学不同艺术研究层面。潘诺夫斯基把图像研究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图像志描述,即对图像所表现内容的具体叙述。第二,图像志分析,即对图像中所表现各种形象的具体描绘和分类。第三,图像学阐释,指在更深一层图像志研究基础上,揭示图像所隐含的深层意义。“对这些‘象征的’价值进行发掘与解释,这就是相对于图像志而建立图像学的目的。”^①根据潘诺夫斯基研究所得,图像学是连接着图像志识别之后的阐释阶段,关注的重点是母题、象征和寓意在其文化中的含义。

潘氏图像研究的三个层面对图像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只不过在研究分析过程中很难系统解释这三个阶段,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尽管‘图像志’与‘图像学’两个词通常可以互换使用,但它们实际上意指两个判然有别的阐释程序。在某种意义上,图像学是在图像志停下来的地方继续向前走。它通过图像志分析来完成鉴定工作,并试图从该图像的更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解释这样的形象是如何且为什么会被选用的。”^②本书基于“图像志”与“图像学”研究方法,试图诠释一幅幅被选中的乐舞图像是如何成为唐代特定文化的“象征”或者“特性”,以反映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

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在注重图像与文史资料的查证下,首先采用图像志研究方法,通过图像进一步解读出乐舞画面所涵盖的意义。即是说,对众多的乐舞图像首先进行描述,弄清图像制作的时间、地点、文

^① 潘诺夫斯基:《图像志与图像学》,载关山月美术馆编《开放与传播·改革开放30年中国美术批评论坛文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356页。

^② [美]安·达勒瓦(Anne D'Alleva):《艺术史方法与理论》,李震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化风俗以及图像主人的意图和图像制作者的审美情趣，并对乐舞的表现内容、形式、舞姿、乐种等要素进行编录、考据，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风俗、审美等方面进行初步阐释。在这两个章节中笔者还按照历史年代进行编辑梳理，对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乐舞图像加以整理并进行简单分类研究。第三章、第四章，在上述收集、整理百余幅乐舞图像的图像志基础上，对唐代甚为流行的乐器——箜篌，以及唐代汉族“长袖舞”与胡族“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舞姿作进一步对比研究，结合唐代不同时期文化、经济、历史、风俗，尝试揭示其“符号”化特征下的文化内涵。

唐代乐舞图像作为唐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对唐代历史研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本书通过唐代不同时期图案的沿革、变迁，探索图像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以及唐人在初唐、盛唐、中晚唐各个时期不同的审美情趣，探索乐舞图像所隐含的潜在意义。对于消失的乐器、遗忘的舞姿，力图通过出土文物中的唐代乐舞图像研究获得复原，因此，唐代乐舞图像研究不仅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现今西安地区文化建设中长安文化的重建和仿唐乐舞的复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以唐代乐舞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中，利用考古学研究方法，以田野科学发掘的文物资料为基础，借助生动形象的乐舞图像，是有别于仅以文史典籍为对象的研究的。唐代乐舞作为唐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频繁出现在前人所撰古籍、诗书中，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同时，唐代“乐”中包含乐器演奏、歌唱和舞蹈的范畴，以具体形象作为视觉审美方式，用图画绘于宅院屋壁之上供人欣赏^①，或镌刻于器皿之上供人享用，还作为权力和荣耀的象征出现在逝者的墓葬中，或者为石刻、石碑雕刻提供特殊的画面。此类乐舞的“流动性”

^① 李肇《国史补》曰：敬修宅屋壁有画《奏乐图》，王维尝至其处，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

形象用美术写实手法留住了音乐、舞蹈一瞬间之乐姿舞容,使乐舞具有了长时间的“可视性”。对田野科学考古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考古学家大量发掘调查工作的进行,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料。这些考古资料中涵盖大量的乐舞图像,是古籍文献中难得的唐代乐舞史信息,这些考古资料的丰富图像不仅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也是对古史文献进行甄别和重新认识的过程。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唐代乐舞及乐舞图像的著录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初至50年代,随着欧洲图像学科的兴起以及外国考察队、探险家的相继闯入中国,大批文物流失海外,文物上的图像以及图像学研究亦为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资料和方法。几乎与此同时,在1910—1928年间,日本出版了《东瀛珠光》六卷^①、《正仓院御物图录》^②,发表了一些正仓院收藏的中国唐土传去的乐器图像。此后,正仓院所藏唐代乐器以及关于此方面研究的不断发表,引起学界的关注。日本学者田边尚雄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著有《中国音乐史》^③,文中汇集了大量的中国史书资料,论述中国音乐与中亚音乐、西亚细亚音乐、印度佛教音乐以及蒙古勃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并附音乐图像73幅。岸边成雄对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中国唐代乐器十八种共75件^④考察论证,提出了较为丰富的唐代乐舞研究成果^⑤,涉及问题较为广泛,其中代表论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⑥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唐代乐舞机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说明太常寺、教坊、梨园、妓馆等其他乐舞管理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以此反映唐代乐舞活动的发展过

① 东京审美学院:《东瀛珠光》六册,明治43年(1910)印本。

② 东京帝室博物馆刊行:《正仓院御物图录》,昭和3年(1928)已刊至十三辑。

③ 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陈清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岸边成雄:《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王耀华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⑤ 岸边成雄的主要论著有《正仓院乐器调查报告概要》、《唐代乐坊的组织》、《唐代乐工的登宫》、《长安北里的性格与活动》、《唐代的音乐》、《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唐代教坊的成立及其变迁》、《唐代的梨园》、《唐代音乐文献解说》、《燕乐名义考》、《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河西音乐——西凉乐与胡部新声》等。

⑥ 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梁在平、黄志炯译,中华书局1973年版。

程。石田幹之助的《长安之春》^①收录论文“胡旋舞小考”，利用中国文献古籍资料，编缀乐事，详细论述了西方文化对唐代长安的影响。林谦三的论著《隋唐燕乐调研究》^②卷首刊图五帧，书中使用大量中国古籍史料、敦煌乐谱等，为乐律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对唐代乐舞的研究甚有裨益。又《东亚乐器考》^③考证了东亚地区，特别是针对8世纪时期中国古乐器的源流、沿革、乐律、乐器名称及语源等问题，文字史料与文物图像结合使用，第一次较为全面地、综合地研究了唐代时期一些主要的代表性乐器，对唐代音乐研究起着重要的指南作用。还有法国研究者伯希和德国伊斯莱克以及日本学人栗田宽、下村三四吉、筒井英俊等^④对此均有研究。

国内学者在20世纪初亦有前人陆续开始借助出土文物研究乐舞艺术，1926年出版的童斐《中乐寻源》^⑤一书包括两卷，依靠文献资料，溯中国音乐之源流，并与西洋乐相对比，论其之异同，为20世纪初中国音乐与外国音乐综合研究之代表。1933年出版的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收录有关唐代长安乐舞与西域乐舞之关系研究的论述，阐明西域文化影响唐代长安的情况，并配有部分出土文物图像和日本传存的唐代乐器、舞蹈形象，解释西域文化在长安的流行发展变化，对唐代乐舞研究有积极的推动作用；1934年孔德撰著的《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⑥，上溯古代夷狄之乐，下迄东方诸国之舞，所述重于史籍，兼有考订，史迹翔实，有较大参考价值；1935年齐如山的《故都市乐考》涉及图像与乐的研究；1936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⑦书中存有大量乐器、舞蹈图像，对中国古代乐器、乐律，舞乐源流述及甚详，其进化发展过程也有论述，是唐代乐舞图像研究不可缺少的资料；童书业于

① 石田幹之助：《长安之春》，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昭和54年第1次印刷。

② 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

④ 引自林谦三《东亚乐器考》，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5页；伯希和著有《箜篌与火不思》，伊斯莱克撰写有《中国的舌簧乐器，笙》，栗田宽撰写有《乐器考》，下村三四吉撰写有《关于箜篌》，筒井英俊撰写有《佛教音乐与箜篌》。

⑤ 童斐编纂：《中乐寻源》，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⑥ 孔德：《外族音乐流传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⑦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47年撰写的论文《唐代的舞与胡式女舞衣》^①，文中使用两件唐代乐舞女俑图像，以说明胡舞输入中原后的种种变异。除此之外，还有朱谦之、沈从文等人^②在论著中对唐代乐舞的述及。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特点：研究对象文史资料多于文物资料；外国研究者将文物资料的乐舞图像最早用于唐代乐舞研究中；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到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涉及唐代乐器问题最为广泛，对后世的研究产生的影响也甚为深远。此书较为全面、综合研究了中国古代一些代表性乐器，他通过对乐器分类史的研究，综合萨克斯和舍夫纳二人的分类法^③，把诸多乐器根据乐器运动的形式分为体鸣乐器、皮（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四类，对唐代乐器分类研究具有指引作用。其次，林氏书中利用中国文献，参照各时期、各地区考古资料，主要针对中国8世纪前后乐器的源起、乐器名称及语源等问题来考察乐器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还有，《东亚乐器考》使用图像共177幅，其来源有正仓院传存的乐舞形象，有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形象，有中国乐书中乐器图像，有斯坦因、伯希和从中国携走之物中的乐舞雕像和壁画形象，有佛塔寺院中的石刻雕塑，亦有金银器皿上的乐伎纹样，图像丰富多样，每一幅图像与文字紧密结合，用美术方法阐述了音乐所具有的“可视性”，文字与图像结合的形式值得赞赏。

遗憾的是，林谦三在研究中，只能利用各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以及日本国内的一些乐器图像，缺少明确的科学发掘出土遗物，在分析论述时借鉴的文物资料有些缺少明确纪年，如在《竖箜篌传入中国的时期》文中使用三条文物资料：亚述的竖箜篌浮雕；中国克孜尔石窟所出弹竖箜篌的天人木雕（伯希和携至德国，今存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正仓院保存的螺钿槽箜篌残品。此三件无明确纪年，导致所作研究必会产生疑点，影响到问题的解决。竖箜篌何时传入中国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林谦三认为竖箜篌传入中国“应当算吕光征龟兹的东晋孝

①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下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7页。

② 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③ 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中载：德国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为体音乐器、膜音乐器、弦音乐器和气音乐器四种。法国舍夫纳两大分类法：固定振动乐器、空气振动乐器。

武帝时代”。^① 随着中国科学考古的发展,出土资料年代的确定,为箜篌于公元前5世纪已传入中国提供了证据。林谦三的《东亚乐器考》大部分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又有部分完成于50年代,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时代的局限和缺少准确纪年的音乐考古资料。

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的乐舞图像资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关注,由于数量有限、保护条件差以及认识不足,并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研究成果稀少。此时期主要以古籍、诗书等文字资料研究为主,国外学人对唐代乐舞的研究影响着国内,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展。1956年,丘琼荪撰写《燕乐探微》一书,以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为出发点,对唐代燕乐的诸多问题作深入的研究,对林谦三书中“误者纠之、疏者定之、阙者补之、棼者理之”^②,可以说是在林氏对燕乐研究基础上的再探索和再延续。丘氏所书在研究唐代乐舞寥若晨星的20世纪50年代,有极重要的史学价值,但遗憾的是对文物资料和乐舞图像均未涉及。任半塘论著《唐戏弄》^③,依靠大量文史资料,探讨了唐代戏弄的生成和发展,以辩体、剧录、伎艺三方面为主体,溯流寻源,逐一考察了构成唐代戏弄的各种因素,探讨了唐戏弄中音乐、舞蹈、歌曲、表演、服饰等方面在唐代的发展水平,此书虽为唐代戏弄之论著,但其中对燕乐、舞姿、乐器多有述及,是研究唐代音乐艺术的主要论著。

随着隋、唐、五代考古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地下文物相继面世,为唐代乐舞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冯汉骥的《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1957年)^④一文以出土考古资料中乐舞雕刻为对象,反映了五代时期音乐、舞蹈的表演形式性质,为考证唐五代音乐、舞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阴法鲁、欧阳予倩等国内学者对此亦有所贡献,在《从敦煌壁画论唐代的音乐与舞蹈》^⑤、《霓裳羽衣曲》^⑥、《唐

① 林谦三:《东亚乐器考》,钱稻孙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页。

② 丘琼荪遗著、魏芾辑补:《燕乐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③ 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冯汉骥:《川大史学·冯汉骥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文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⑤ 阴法鲁:《阴法鲁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9页。

⑥ 同上书,第169页。

宋大曲的结构》^①、《唐代的音乐艺术》^②、《试探唐代乐舞》^③、《唐代乐舞续谈》^④等论文中结合敦煌壁画和正仓院的唐代乐器形象,论述了唐代音乐舞蹈的流播趋势。

1961年在莱比锡开始由多个学者撰写的规模最大、包容最广的音乐图像研究成果《音乐历史图像》,以世界各地文化为主,包含音乐历史、社会生活、乐器及种种相关信息。随后各处出现了一些散见的研究论文,使音乐与美术图像学合之有序,学科逐渐融合并交叉发展。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科学发掘出土的文物资料越来越多,60年代至70年代前后随着昭陵、乾陵、献陵等众多唐代陵墓的发掘,一大批有关音乐、舞蹈方面的考古资料出土,为80年代后的乐舞艺术研究提供了有准确纪年的新资料。考古界亦对有乐舞形象的壁画、俑类、石刻、金银玉器出土文物更加重视,运用文献资料对表现乐舞画面的文物资料进行诠释,同时出版了一批图谱、照片,为唐代乐舞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承载乐舞图像出土文物的展出和图像资料的公布,更多学者参与其中,使唐代乐舞图像研究有较大发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较前有所扩大和增加。此时段主要是以考古发掘为基础的科学著录和研究的阶段,也包含一些注重史料,结合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著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以史书典籍为主,结合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王昆吾论著《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研究》^⑤(1985年),以隋唐五代的长短句歌辞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宫廷祭祀乐歌歌辞),论述音乐与歌辞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使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隋唐五代歌辞隶属文学范畴,融诗、乐、舞于一体的隋唐乐中歌辞明显是音乐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在此研究领域还有学者不断探索,如周期政博士的论文《唐代乐舞歌辞研究》^⑥,在文学与音乐相融合基础上,以唐代音乐和舞

① 阴法鲁:《唐宋大曲的结构》,载《舞蹈丛刊》第1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阴法鲁:《唐代的音乐艺术》,载《人民音乐》1959年第3期。

③ 欧阳予倩:《试探唐代乐舞》,载《舞蹈》1959年第3期。

④ 欧阳予倩:《唐代乐舞续谈》,载《舞蹈》1960年第6期。

⑤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词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⑥ 周期政:《唐代乐舞歌辞研究》,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蹈的歌辞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之关系,从清乐、雅乐、燕乐几个方面,论述唐代乐舞对歌辞繁荣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唐代音乐与歌辞文学相互交叉研究之所得。

常任侠的《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①利用大量文史资料,结合部分文物资料阐述西域音乐艺术东渐对唐代长安的影响。周菁葆撰写的关于唐代乐舞的系列论文^②,秦序的《唐九、十部乐与二部伎之关系》^③,柯黎、张维的《唐乐舞“坐、立部伎”与“九、十部乐”之关系》^④等论文均以文史资料为依据对唐代乐舞展开研究。此外,还有一部分博士论文也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孙晓辉博士的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⑤、袁禾博士的论文《论中国宫廷舞蹈》^⑥、刘洋博士的论文《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⑦等。

第二,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发掘,日益增多的考古出土文物为唐代乐舞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图像资料,这些考古报告中的乐舞图像资料以及各地博物馆、研究机构陆续出版的乐舞图录、图典,为唐代乐舞图像研究不断提供新资料,其中,刊布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唐代乐舞图像资料的图典、图录有:方建军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⑧的编撰把若干幅西安地区出土的唐代文物中乐舞图像收录在案,尽管只占西安地区出土音乐文物中的一部分,却为中国乐舞图像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南作用。

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⑨一书以乐器图像为主,从新石器时期至明清,对全国文物资料中的乐器图像及乐舞图像进行了

① 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载《音乐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周菁葆:《古代丝绸之路音乐舞蹈钩沉》,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箜篌及其东渐》,载《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风首箜篌(上)(下)》,载《乐器》2010年第4、5期。

③ 秦序:《唐九、十部乐与二部伎之关系》,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④ 柯黎、张维:《唐乐舞“坐、立部伎”与“九、十部乐”之关系》,载《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⑤ 孙晓辉:《两唐书乐志研究》,扬州大学古代文学博士论文,2001年。

⑥ 袁禾:《论中国宫廷舞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0年。

⑦ 刘洋:《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论文,2008年。

⑧ 方建军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

⑨ 修海林、王子初:《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综合整理,书中收录唐代西安出土文物中乐舞图像还十幅。还有一些图典、图录、图册刊布有壁画、乐俑、石刻、金银玉器等考古资料所承载的唐代乐舞图像,主要有以下数种:

- 《中国音乐史图鉴》收录隋唐五代乐舞图像 89 幅^①;
- 《中国舞蹈文物图典》收录二百余幅^②;
- 《图说中国音乐》收录 31 幅^③;
- 《图说中国舞蹈史》收录 50 幅^④;
- 《昭陵唐墓壁画》收录 15 幅^⑤;
- 《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收录 6 幅^⑥;
-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收录 10 幅^⑦;
-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金银器卷》收录 6 幅^⑧;
-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俑卷》收录 19 幅^⑨;
- 《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收录 5 幅^⑩;
- 《章怀太子墓壁画》收录 4 幅^⑪;
- 《懿德太子墓壁画》收录 3 幅^⑫;
- 《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画》收录 5 幅^⑬;

① 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 刘伯恩编著:《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赵会生、王旭主编:《图说中国音乐》,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④ 冯双白、王宁宁、刘晓真编:《图说中国舞蹈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⑤ 昭陵博物馆:《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6 年版。

⑥ 陕西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 1998 年版。

⑦ 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⑧ 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金银器卷》,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⑨ 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陶俑卷》,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⑩ 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玉杂器卷》,三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⑪ 张铭治:《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⑫ 申秦雁:《懿德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⑬ 李国珍:《新城、房陵、永泰公主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2 年版。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收录3幅^①；

《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上、下册收录唐墓壁画乐舞图像14幅^②；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录乐舞图像13幅^③；

《隋唐文化》收录乐舞图像5幅^④；

《陕西古代石刻艺术》收录乐舞图像4幅^⑤。

第三，以文史资料为依据、文物资料为基础，用图像阐释唐代乐舞的源流、发展及变化。主要论文有：陈炎的《唐代骠国献乐考》^⑥，运用文献和国内外研究成果，辅之相关文物资料，旁征博引，对唐代骠国音乐、乐器、音律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献乐年代、乐器、来使身份、路程以及积极影响等几个方面，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文中配置文物图像，在内容丰富的基础上又具可观赏性。

王维真的《汉唐大曲研究》^⑦，使用出土文物图像、敦煌乐舞壁画、正仓院传存的中国唐代乐舞形象40幅，图文相合，说明唐代大曲的构成特征。沈冬的论著《唐代乐舞新论》^⑧，刊布25幅乐舞图像，其中有西安地区出土文物中乐舞图像、敦煌壁画、石窟造像、正仓院唐代乐器形象、博物馆乐器图像等，以唐代雅、胡、俗三乐并力发展、彼此争胜为纲领，提出“以胡入雅、以胡入俗、以俗入雅”的发展脉络，对唐代乐舞的研究可谓另辟蹊径，有独到之处。

牛龙菲的《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⑨两卷，共分文献、形象两大类。文献记载有东汉元嘉二年（152年）的简牍乐谱残片，有唐代抄本乐谱，有关于古代音乐生活、乐伎、乐像、乐器、乐舞表演的文字记载，主要对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初唐、盛唐、中晚唐、

① 齐东方、申秦雁主编：《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吕建中：《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④ 王仁波：《隋唐文化》，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

⑤ 李域铮编著：《陕西古代石刻艺术》，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陈炎：《唐代骠国献乐考》，载《陈炎文集》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4页。

⑦ 王维真：《汉唐大曲研究》，台北：学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沈冬：《唐代乐舞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⑨ 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